

DOI: 10.13253/j.cnki.ddjjgl.2024.06.003

# 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现实路径

张震宇<sup>1</sup>, 侯冠宇<sup>1,2</sup>

(1. 中国政法大学 商学院, 北京 100088; 2. 东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北 秦皇岛 066004)

**[摘要]** 新质生产力已成为当前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 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尽管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 但如何有效提升生产力水平、促进科研与产业的融合、提升科技创新的水平, 以及攻克核心技术的短板, 仍然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微观层面, 新质生产力主要表现为技术创新的飞跃和企业组织模式的变革; 中观层面, 新质生产力体现为优化产业链结构、重塑产业集群、构建创新网络; 宏观层面, 新质生产力开启了新型经济发展模式, 促进了社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新质生产力不仅象征着创新、绿色、现代化的先进生产方式, 还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高效发展的动力。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更高层次发展, 需要应对全球经济和市场制度的挑战, 不断加强技术创新, 继续深化改革的实践与理论研究。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 中国式现代化; 新发展格局

**[中图分类号]** F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 (2024) 06-0020-10

## 一、引言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 既体现了全球现代化的共性, 又彰显了中国特色。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及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贯彻应用, 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出发, 强调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地位。在应对社会发展挑战方面, 中国式现代化成功规避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诸多问题, 如资本主义集中化、社会分化、过度物质主义, 以及对外扩张等。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 并在探索更为优越的社会制度时向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在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的调整过程中, 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开拓创新。随着社会发展, 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模式不断涌现, 生产力体现为人类对自然的利用

和改造能力, 社会进步体现为生产力的从低级到高级、从旧质到新质的转变。习近平总书记准确把握了新时代科技革命和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 创新提出了新质生产力概念。在社会主义新时代, 以“新质生产力”为代表的生产方式正在重塑社会生产关系, 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持续动力。

当前, 中国经济正面临内外需求减少、产业结构调整及经济预期转弱的三重挑战。而西方国家走上了一条以资本主导、贫富差距扩大、生态破坏和对外扩张的现代化之路。与之不同, 中国式现代化是共同富裕的时代背景、发展土壤和实现条件<sup>[1]</sup>, 主张共同发展, 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和西方现代化有着显著差异。新质生产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新活力, 推动其高质量发展。因此, 研究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机制与现实路径, 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收稿日期: 2023-12-18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专项项目“中华传统的中国经济学解释研究”(2023JZDZ022)。

作者简介: 张震宇 (1989—), 男, 北京市人, 博士, 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研究人员, 研究方向为中国经济问题; 侯冠宇 (1996—), 男, 吉林吉林人, 本文通讯作者,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 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为中国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

## 二、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

### (一) 新质生产力的概念与特征

新质生产力是指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生产力, 强调关键和颠覆性技术的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这种生产力转型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 还推动了经营管理方式的变革, 促进了社会生产效率的提升。对新质生产力的理解须从其创新性(“新”)和质变性(“质”)两个维度出发。它侧重于创新、知识和技能的应用, 利用先进设备和技术, 以达到更高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sup>[2]</sup>。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深化和补充, 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时代意义, 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获得了新的时代价值<sup>[3]</sup>。这一发展过程从毛泽东的“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sup>[4]</sup>观点, 到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 再到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对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相结合的观点, 体现了新质生产力概念的不断丰富与发展。中国在生产领域领域的成就可追溯至1958年首台电子管计算机的试制成功, 之后包括半导体三极管、二极管、两弹一星一艇(核潜艇)等重大科技成果的相继问世。近年来, 中国在高铁技术、5G、6G、航天航空航海等技术领域取得的重大突破, 更是凸显了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变化<sup>[5]</sup>。生产力的这一发展趋势不仅肯定了科技创新作为社会发展驱动力的重要性, 同时也突出了新质生产力在当前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核心角色。

在人类改造自然和创造财富的过程中, 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工具构成了生产力的基本要素。马克思的生产社会化理论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 以生产为基础, 揭示了生产发展和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sup>[6]</sup>。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发展了劳动者与劳动工具的内涵, 完善了生产关系的内涵。新质生产力调整了现代劳动模式, 优化了劳动结构并改善了人力资本的结构, 加强了数字化和科技化生产工具的使用, 降低了传统产业中体力劳动者与简单机械的使用。高级人力资本具备深度理解自然及人类活动的的能力, 同时拥有创新精神和掌握高端设备技能, 增强了生产效益。在劳动资料方面, 新质生

产力使用的是先进、精密、尖端的设备, 与传统生产力使用的传统生产工具相比, 提高了生产体系的效率和产品质量。因此, 新质生产力在劳动方式上表现出先进性, 推动了传统生产力的转型。

### (二) 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及其特点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体现了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 更体现了基于国情的中国特色。2022年我国全部工业增加值突破40万亿元大关, 在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 4成以上产品产量位居全球第一, 制造业规模连续13年位居世界首位<sup>[7]</sup>。

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开始了长期且复杂的现代化建设进程。最初的现代化始于“一五”计划时期, 当时通过苏联的技术支持, 我国启动了包括156个基础工业项目在内的大型工业化建设。1954年,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 标志着我国经济转型的起点。在发展初期, 中国经济以农业为主体, 工业结构尚待完善。当时, 参考苏联工业化模式, 我国采取了“以工业为主导、农业为辅助”的发展策略。“一五”计划重点发展重工业, “二五”计划则强调了农业对工业的支撑作用。这种策略虽在短期内促进了工业发展, 但长期看来导致了重工业过度扩张与农业发展的相对滞后, 进而引发了经济的不平衡。1960年的粮食危机更是暴露了现代化进程中的脆弱性。“三五”计划起, 政府重新评估了农业的重要性, 并致力于工农业的结合发展。尽管国际形势和国内工业水平限制了某些地区的发展, 但工业现代化仍然是优先发展的领域。改革开放后, 中央政府逐步调整发展策略, 重视城乡均衡发展, 根据中国信通院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2年)》,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规模虽然仅为美国的46.4%, 但31.5%的规模增速远高于美国的12.5%及发达国家的13.1%<sup>[8]</sup>。2023年, 中国经济回升向好, 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 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sup>[9]</sup>。但快速城市化带来的土地、资源和环境压力加剧了城乡差距。为此, 各级政府提出了工业、城市和农业协同发展的战略, 在“十四五”规划中, 中央政府进一步强调了工农业、城乡的协调发展<sup>[10]</sup>。由此, 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策略经历了从工业优先到城乡协同发展的转变, 为新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指明了方向。

### （三）新质生产力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

新质生产力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生产力的发展有效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水平的提升，截至 2022 年底，全国移动通信基站总数达 1 083 万个，全年净增 87 万个。其中 5G 基站为 231.2 万个，全年新建 5G 基站 88.7 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 21.3%<sup>[11]</sup>；云计算市场高速增长，2022 年市场规模达 4 550 亿元，同比增长 40.91%<sup>[12]</sup>；2022 年，我国大数据产业规模达 1.57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sup>[13]</sup>。无论是在革命、建设还是改革的各个阶段，党和国家始终将生产力发展放在重要位置，不断强调其关键作用，进而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新质生产力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自中国共产党 1921 年成立以来，始终秉承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探索符合国情的现代化路径。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阶段，党和国家不断强调生产力的关键地位，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领导人民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重点发展工业、农业和科技，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复苏和发展<sup>[14]</sup>。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深化思想解放，推动市场化改革，积极引进外资和技术，使中国经济逐渐融入全球体系。这一时期，新质生产力在促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展现了巨大潜力，互联网、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不仅转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还促进了经济持续增长<sup>[15]</sup>。新质生产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如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在城市规划中的应用提高了管理效率和智能化水平；在环境保护方面，新质生产力促进了绿色产业发展；在医疗健康领域，新质生产力提高了服务质量和效率，改善了人民的医疗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是党的领导、市场化改革和人民奋斗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中，高质量发展体现在以人民为中心的生产力高度发达、质的有效提升，以及量的合理增长等方面<sup>[16]</sup>。

### 三、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逻辑

#### （一）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提高生产效率

新质生产力是一种先进的生产模式，其核心

在于提升生产效率。此种生产力模式的特征包括运用前沿的生产工具、采用先进科技和雇用高水平的人力资本，从而实现劳动者、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科学结合。在制造业中，自动化和智能化技术的应用显著提升了企业的生产效率，减少了人工干预和错误率，物联网技术的引入实现了设备间的实时通信和生产过程中问题的及时反馈，进而优化了生产流程。在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通过无人机和智能农机等技术的应用，优化了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精准施肥和喷药技术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同时，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对农田的生长状况进行精确预测，为农民提供科学的种植建议。在服务业，新质生产力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物流行业中的无人机和无人车技术实现了货物的快速、精准配送，显著提升了物流效率。在医疗领域，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使诊断更准确、治疗更个性化。新质生产力的应用不仅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模式，还催生了众多新兴行业和新的就业机会<sup>[17]</sup>。

新质生产力在当前的科技革命中扮演了主导角色，推动了高新科技的发展，并推动了新兴产业的壮大。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新质生产力显著提升了产业效率。为深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及其发展，应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中进行分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协调发展是现代化研究的核心。从这一视角出发，新质生产力理论是对传统生产力以及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补充，丰富了传统生产力理论体系。新质生产力的先进性不仅在于其与传统生产力模式的比较，更重要的是它对科技进步和高质量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以及其对人类和社会整体进步的贡献。

#### （二）科技创新：新质生产力驱动技术进步

新质生产力在推动技术进步和加强科技创新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新质生产力不仅提升了科学创新的水平，而且提高了技术发展的效率。科技创新包括新工艺、新材料、新技术的应用与推广，以及生产流程的改进、经营模式的优化和业态的创新。新质生产力在科技创新中主要涉及数字技术创新、绿色生态创新和蓝色产业创新三个关键维度。

近年来，我国持续增加科学研发投入，显著



提升了行业技术水平。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2012 至 2022 年间, 我国基础科研经费从 499 亿元增长至 2 023.5 亿元, 增加了 3 倍多, 极大地提升了基础科学研究的水平。在低温超导、量子计算、干细胞培养和分子生物学等领域, 我国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sup>[18]</sup>。

生产力关系被视为劳动者与劳动对象之间的连接和中介, 其中生产工具是判断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关键。在当前的生产力发展过程中, 科技创新已成为核心, 特别是在劳动者技能、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多样化方面,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数字技术的创新和科技产业的革命。此种基于数字技术的生产力, 即“数字生产力”, 其关键在于通过数字技术整合其他生产要素, 以满足社会现代化发展的需求。

随着时代变迁, 生产力发展已从对传统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关注转为对绿色生态和蓝色产业的关注。绿色、低碳观念的盛行和新能源技术的进步促成了“绿色生产力”的形成。它不仅增强了生产力, 还强调了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协同发展。海洋科技的进步和陆地资源的互补使得“蓝色生产力”逐渐显现其重要性, 其核心理念在于协调海洋与陆地资源, 实现资源和产业的互补。

在农业领域, 现代农业技术的推广使农业生产更加集约化和高效化, 为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注入了新动力。在制造业领域, 智能制造的广泛应用提高了生产过程的效率, 降低了成本, 提升了产品质量。在服务业领域, 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新服务模式正在改变传统业态, 推动服务业的升级换代。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 中国持续加强区域经济合作, 这不仅为经济的持续发展创造了新机遇, 还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动力<sup>[19]</sup>。

### (三) 产业升级: 新质生产力驱动规划实施

在新时代背景下, 党和国家科学规划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阶段性任务及发展路径, 明确指导了其实施方向。伴随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 我国正致力于推动新质生产力在各产业的应用, 并调整区域间的产业结构。这种产业升级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有力支撑。以制造业为例, 据初步统计, 目前我国已建成 2 500 多个数字化车

间和智能工厂, 这不仅加速了汽车、家电等行业产品的升级和交付能力, 也提高了钢铁、石化等大型行业的安全和绿色发展水平<sup>[20]</sup>。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 保证产业链安全可靠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任务<sup>[21]</sup>。在“十四五”规划期间, 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 各地区顺利完成了改革发展任务, 保持了社会大局的稳定。各级政府持续推动经济发展, 优化产业结构, 提升产业链的韧性和优势, 展现出我国经济的韧性、潜力和动力。

新质生产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2035 年宏观发展目标是显著提升经济、科技及综合国力, 跻身于创新型国家领先地位, 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 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 并全面发展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和健康等领域。21 世纪中叶的远景目标是使中国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实现这一目标, 新质生产力将整合全球发展动态, 准确把握人民期望, 灵活稳健地处理政策规划与落实过程, 积极应对当前机遇和挑战, 切实解决关键战略问题。

通过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与普及, 可以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增长、产业结构调整、科技创新能力增强、新发展模式与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改革开放深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加强、人民文化生活丰富、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提高, 继续向美丽中国目标迈进。

### (四) 社会转型: 新质生产力助推高质量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径与西方国家现代化路径不同, 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之一是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的同步推进。新质生产力, 尤其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新质生产力,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驱动力。在 2012 至 2022 年间, 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达 6.2%, 超过了世界经济 3.0% 的平均增速; 同时, 人均国民总收入从 5 910 美元增长至 12 604 美元<sup>[22]</sup>。这一数据揭示了从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转型的过程, 科技创新的强大动力将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 加速我国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变。

新质生产力在中国现代化转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 推动着社会全面转型。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引致了就业结构的变革，技术密集型劳动逐渐取代传统体力劳动，提升了就业质量和环境。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高品质、个性化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增长，推动了消费结构的升级<sup>[23]</sup>。数字化、智能化治理模式的兴起提升了社会治理的效率和水平。

新质生产力还助推了生态与经济的融合发展。我国人口规模庞大，经济发展不仅依靠新质生产

力，也需要生态资源的支持。实现社会转型目标，需确保新质生产力的持续发展。新质生产力强调摆脱对资源的过度依赖，融合生态发展理念，走绿色、可持续发展道路。这一路径不同于掠夺性资源模式，更多依赖内部发展机制而非外部资源的掠夺。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理念在于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平衡，这种平衡在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下得以实现（见图 1、表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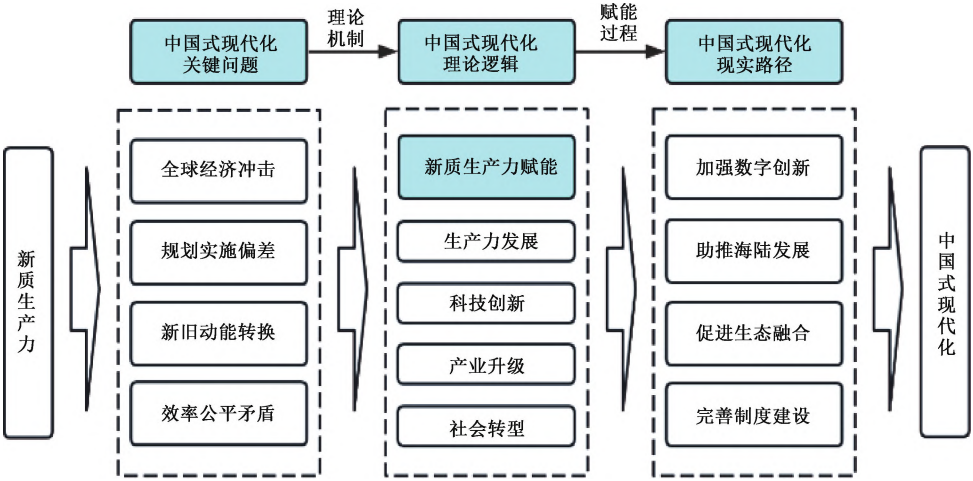


图 1 理论框架

注：图片来源为作者绘制。

表 1 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基础

理论基础	驱动要素	具体内容
生产力理论	改造自然能力	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力量
内生增长理论	科技创新	经济增长不依赖外部推动，而是由内生的技术进步决定，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
产业升级	产品附加值提高	使产品附加值提高的生产要素改进、结构改变、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提高、产业链升级
社会转型	体制发展	社会经济结构、文化形态、价值观念等发生深刻变化，经济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过程

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关键问题

（一）全球经济冲击：区域发展与安全隐患增加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全球经济下行压力的增加、经济风险增加，中国正处于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的双重压力中，不确定性和超预期因素日益增多。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变得复杂且严峻，各类风险隐患积累。全球正在经历深刻的转型和动荡，“逆全球化”趋势和地缘政治等问题频发，制约了世界贸易规模的增长和全球产业链

的构建。  
首先，全球经济摩擦加剧。据《IFF2023 年全球金融与发展报告》，2023 年全球经济增速预计为 3.1%，低于 2022 年的 3.4%<sup>[24]</sup>。地缘政治纷争加剧全球产业链不稳定性，如中美贸易摩擦的持续影响。这种国际贸易冲突导致制造业产业链出现“去中国化”趋势，威胁我国供应链安全。全球产业链可能分裂，形成多重区域合作、加剧国际分歧。同时，发达国家的高技术管制和贸易壁垒限制了发展中国家的进步，对区域科技创新活动构成挑战，并影响我国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

其次, 区域贸易保护主义盛行。近年来,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加剧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2022 年, 中国纺织服装行业共遭遇 15 起国外贸易救济调查, 案件量同比增长 15.3%, 涉案金额 24.14 亿美元, 同比增长 15.6%。中美贸易摩擦、印度对华关税等措施, 对全球贸易产生严重负面影响, 进而影响区域经济发展。“逆全球化”趋势显现, 制约了全球经济的开放。

最后, 全球经济进入下行周期, 经济发展增速放缓。当前, 我国经济面临实现“增量提质”的挑战, 地区发展受到更多制约。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要求各地区均衡发展, 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实现这一目标需面对土地、环境、碳排放和能源等方面的制约。同时, 人民对更高生活水平的期望, 使促进居民收入增长和共同富裕的任务变得更加艰巨。部分产业存在的制度障碍也限制了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 (二) 规划实施偏差: 顶层设计与地方实施偏差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 顶层设计与地方落实间存在偏差。基层落实在这一进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不仅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还为地区发展提供了实际应用的基础。尽管基层在服务群众、衔接中央与地方政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部分地区基层生产力的发展仍相对落后。根据《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2020)》, 2020 年共有 109 件垄断案件得到结案, 其中 67 件涉及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 占结案总数的 61%。这反映了从生产力理论到实践应用的多重挑战。

首先, 顶层设计与地方执行之间的差异明显。尽管党和国家为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宏观科学的指导, 但顶层规划与地方实践间仍存在偏差。据不完全统计, 2022 年全国至少有 6 起因执法机关在适用法律法规方面的失误而败诉的行政诉讼案件<sup>[25]</sup>, 这反映出在部分地区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与中央政策“不同步”“不协调”情况。

其次, 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多重困境。全球经济增长动力减弱及主要经济体增速的放缓, 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经济面临的下行风险。同时,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及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对我国的供应链安全构成了双重威胁, 使得产业链和创新链面临风险挑战。

最后, 部分地区陷入经济发展的低端锁定。部分区域因地理位置、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等因素, 长期位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 依赖低成本、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面临环境污染、资源消耗等问题。在实践中, 区域发展面临的挑战包括如何精准满足区域生产需求, 确定合适的现代化产业标准, 以及在满足多元化市场需求的同时制定统一的行业政策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与中央政策制定理念相关, 也与地方政府执行能力紧密相关。

## (三) 新旧动能转换: 新生力量与传统产业摩擦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 随着新旧动能的转换, 新质生产力与传统产业间存在矛盾和冲突。中国经济正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sup>[26]</sup>, 产业新动能的发展主要依托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 以期实现经济结构的根本变革。1979 年, 中国产业结构呈现“二、一、三”的格局,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分别为第一产业 30.7%、第二产业 47%、第三产业 22.3%。而到 2022 年, 产业结构变为“三、二、一”, 比重分别为第一产业 7.3%、第二产业 39.9%、第三产业 52.8%。这种变化反映了产业结构适应经济发展的变革, 体现了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sup>[27]</sup>。当前, 我国劳动密集型、粗放型产业逐渐缩小, 而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集约型产业规模扩大, 需要通过技术创新和升级驱动传统产业进步, 才能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首先, 我国人口红利减弱, 劳动力成本上升。在全球传统贸易模式中, 中国依赖制造业的初级加工和劳动成本优势, 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形成庞大的制造业产业集群, 成为全球制造中心。但随着人口结构变迁, 尤其是青年劳动力数量减少, 我国人口红利减弱、劳动力成本上升。根据法定退休年龄统计, 1962—1975 年出生的人口将在 2022—2035 年逐渐退休, 即使实施“二孩政策”, 出生率仍在下降, 抑制了经济的潜在增长<sup>[28]</sup>。

其次, 企业经营成本上升, 资源及环境受限。由于传统能源逐渐枯竭和环境问题恶化, 中国面临严峻的资源和环境挑战。根据世界银行《大宗商品市场展望》报告, 2023 年全球能源价格上涨 50.5%。中国产业对石油、铁矿石和铜等关键资



源的依赖不断增强<sup>[29]</sup>，可能引起外部资源供应风险，对部分地区能源安全造成威胁。

最后，传统产业面临多重挑战与发展瓶颈。随着现代化推进，传统生产模式遇到困境，部分行业或企业产能超过市场需求，导致产品过剩、竞争加剧、价格下跌，对区域经济造成负面影响。2008 年以后，钢铁和煤炭产业开始面临产能过剩问题。尽管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钢材生产国，但高端钢材和技术创新与国际先进水平仍有差距，产能过剩将成为制约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焦点问题<sup>[30]</sup>。

#### （四）效率公平矛盾：经济增长与公平正义兼顾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备受关注。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基尼系数已突破 0.4，这一数据反映出效率与公平问题已成为一项紧迫挑战。

首先，财富价值分配机制亟须完善。劳动剩余价值的占据和工资的本质反映了劳动力的价值，而工资的形式则是价值形态的体现<sup>[31]</sup>。据《新财富》测算，我国最富有的榜单级人群（500 人）2021 年总财富 17.7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70%<sup>[32]</sup>，说明财富集中程度加剧。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协调效率与公平的矛盾。然而，在经济总量提升的过程中，部分劳动者的剩余生产价值被他人占据，影响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社会分配体系依然有待完善<sup>[33]</sup>。

其次，地区间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亟待解决。贫富差距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公正和稳定问题。在 2006 至 2020 年的 15 年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始终在 0.462~0.491 之间波动，且在 2015 年之后再次呈现上升的趋势<sup>[34]</sup>。当社会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而大部分人口处于贫困状态时，这将影响社会的公平与稳定。目前，中国城镇家庭净财富是农村的 2.28 倍。若无法实现收入均等分配，各行各业不平等问题将进一步加剧。

最后，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存在。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2022 年人均 GDP 为 1.2 万美元，与富裕国家存在显著差距。因此，促进经济发展、实现区域平衡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任务。同时，收入分配与财富分配之间的关系也需改善。

尽管基于生产要素贡献的市场评价机制能够促进生产活力与效率的提升，但可能会带来收入分配不均。尽管进行了税收与其他分配政策调整，但初次分配的收入不均等问题依旧亟待改善。为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有必要优化社会保障体系，实现财富科学分配，同时正视经济发展过程中效率与公平潜在的矛盾。

### 五、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路径

#### （一）加强数字创新：现代技术的核心动力

新质生产力通过加强数字创新，构建现代化的核心技术体系。数字经济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sup>[35]</sup>，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提供了重要支持，成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问题<sup>[36]</sup>。技术创新作为社会进步的关键推动力，在国家和民族发展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当前的发展背景下，创新需要超越单一经济或社会部门的界限，实现跨部门合作，形成一个完整的社会创新系统。

首先，建立国家的自主创新体系，促进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的深度融合。面对产业发展的核心技术、社会发展的瓶颈技术及国家安全的关键技术，相关机构需要进行前瞻性规划和部署。在此背景下，需要加强国家实验室、顶尖研究机构和研究型大学的成果转化，解决“卡脖子”问题。同时，需要为中小企业在创新体系中的发展创造有利的营商环境，提升民营企业的创新动力。

其次，促进新质生产力普及，培育数字化创新人才。在数字化创新人才培养过程中，需加强劳动者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的培养，提升数字人才的团队合作和沟通能力，加强专业人才的职业道德水平和法律意识。企业应提升知识型和技术型人力资本在数字化转型中的比重，投入充足人力资源，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发和创新活动，并持续优化产业劳动结构。

最后，提高产业数字化的自主经营水平。掌握核心技术对确保现代化进程主导权至关重要。因此，需要利用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集中资源攻关核心科技，掌握芯片、半导体、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鼓励企业加强数字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同时，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确保我国企业在全域科技领域的竞争力，

并推动科技与数字产业的紧密结合<sup>[37]</sup>。在数字经济时代, 传统产业的转型和数字技术的融合, 不仅需要新质生产力与实体经济的深度整合, 也需要继续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并加强国际科技合作。

## (二) 助推海陆发展: 现代经济的协同模式

新质生产力助推海陆区域发展, 形成现代经济的协同运营模式。作为海洋经济的核心要素, 蓝色生产力对沿海地区的生态稳定具有重要作用, 是推进海洋强国战略的关键。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 必须充分发挥蓝色生产力的作用, 实现蓝色生产力、蓝色经济和蓝色生态的统一发展。通过深化海陆间的合作, 实现海陆统一发展的目标, 在区域经济政策引导下, 提升蓝色生产力水平, 实现海洋经济与海洋生态的协同发展。

首先, 完善海洋经济政策, 促进蓝色生产力与海洋产业的融合。加强涉海部门间的协同合作, 改善政府与企业间的伙伴关系, 确保蓝色生产力、蓝色经济与蓝色生态三者的和谐发展。地方政府应整合相关部门资源, 优化资源配置, 明确各地发展需求, 加大对海洋科技和人才培养的投入, 推进高质量蓝色经济和生态保护。强化科技与产业之间的整合, 形成创新型蓝色经济结构<sup>[38]</sup>。

其次, 提升蓝色生产力的科技创新能力。发挥科技创新在海洋生态保护中的核心作用, 推进海洋产业向绿色、环保、高效和节能方向转型。引入国际先进生产技术与管理方式, 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 促进研究机构间的数据共享和技术交流, 建设高效实用的海洋观测系统, 确保海洋科技创新真正用于生态保护领域。

最后, 促进海洋经济的集约转型。在蓝色经济与蓝色生态之间建立紧密联系, 加强海洋产业的生态保护。严厉打击过度开发资源和损害生态环境的行为, 确保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协同发展。沿海地区应坚守生态为先的发展策略, 严格执行海洋生态保护的底线政策, 推动蓝色生产力发展、扩大海洋产业规模、增加经营融资渠道, 最终实现海洋经济的生态转型。

## (三) 促进生态融合: 现代生态的绿色转型

新质生产力促进生态融合, 助推现代生态的绿色转型。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过程中,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至关重要。面对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成为全球关注的

焦点<sup>[39]</sup>。随着新质生产力发展, 需要将生态环境成本纳入国民生产体系, 优化自然资源配置和利用、提高环境标准, 强化生态环境法律机制。

首先, 打造经济生态融合发展模式。这一模式强调经济与生态的相互促进和融合。具体措施包括推广绿色生产方式、促进产业升级和转型、推动循环经济发展,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这些措施能够提高经济效益、促进社会和谐并改善人民生活质量。在此种模式中, 需要依靠政府、企业和公众的共同推进: 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和法规, 推动经济与生态融合发展; 企业采取环保措施, 推广绿色生产方式; 公众参与环保行动, 支持和监督政府与企业落实环保责任。

其次, 驱动生产力的绿色转型。从生产体系和驱动机制角度关注绿色转型的成本、产业升级及清洁生产技术的进步。优化调整资源再配置中的摩擦成本, 完善绿色转型的路径。实现生产力的集约化、绿色化转型, 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鼓励知识投入、高质量劳动力的发展, 减少资源浪费、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生态产业, 推动生态产业化的实现。

最后, 深化改革, 完善生态制度。通过定价机制实现产品的环境标准, 进行绿色成本精确核算, 克服国际绿色贸易障碍, 确保中国产品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生态环境管控法律应具有宏观性和全局性<sup>[40]</sup>, 各级政府需不断完善与现实需求相匹配的环境制度建设, 确保区域制度的稳定运行, 强化环境监管机制和补偿方案, 及时对违反环境法规的行为进行处罚。

## (四) 完善制度建设: 现代中国发展的根本保障

新质生产力提升制度建设水平, 成为现代中国发展的根本保障。在新时代背景下,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 新质生产力的提升与制度建设水平密切相关。为了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 必须紧紧依托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加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设, 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制度。

首先, 以新质生产力为引领, 提升地方政府的战略执行与治理能力。各地区需要严格遵循党和国家的基本路线, 鼓励创新创业, 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同时,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经济现代化至关重要。需要优化相关机构职责和组织结构,



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优化创新资源的配置。

其次,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消除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障碍、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体现按劳分配原则,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同时,推进共同富裕,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加强税收调节机制、营造公平竞争环境。秉持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强化公有制经济地位,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最后,全面深化对外开放、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充分利用国内外市场资源。持续扩大对外开放规模,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形成对全球高端资源的吸引力。加快区域人才流动、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和深化国际合作。同时,协调国家、市场和社会间关系,优化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这些措施将为新质生产力在中国的应用和发展提供支撑,推动中国经济持续繁荣,从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

## 六、结论

新质生产力已成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最具活

力和创新的动力。从微观层面看,新质生产力创造了新型技术系统、生产单元,变革了企业的组织模式;在中观层面,新质生产力促进了新型产业部门、产业链、产业集群及创新网络的形成;在宏观层面,新质生产力推动了国家创新体系、新经济形态的发展,以及社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尽管中国在现代化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仍须提升科技创新水平,促进科研创新与产业发展融合,突破关键技术领域的短板,解决“卡脖子”等问题。新质生产力集成了数字化、绿色化、低碳化特点,是生态文明型生产力。其核心在于提升生产力水平、加强科技创新速度、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社会经济转型。因此,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高效、可持续发展,中国需要积极应对全球经济冲击、规划实施偏差、新旧动能转换、效率公平矛盾等挑战。逐步突破制度、文化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制约,并增强产业技术与系统创新能力。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路径中,通过加强数字创新、助推海陆发展、促进生态融合、完善制度建设等措施,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取得显著成就,并在国际舞台上产生重要影响。

## [参考文献]

- [1] 江剑平. 中国式现代化下的共同富裕: 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 [J]. 当代经济管理, 2024 (1): 1-9.
- [2] 周文, 许凌云. 论新质生产力: 内涵特征与重要着力点 [J]. 改革, 2023 (10): 1-13.
- [3] 蒋显荣. 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人类社会规律认识的原创性贡献 [J]. 湖南社会科学, 2023 (5): 1-8.
- [4]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 (第 2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269-270.
- [5] 程恩富, 陈健. 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加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J]. 当代经济研究, 2023 (12): 14-23.
- [6] 赵峰, 周慧珍, 段雨晨. 马克思生产社会化理论及其整体协调观——兼论系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J]. 经济学家, 2023 (11): 26-36.
- [7] 曲永义. 实现新型工业化是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关键任务 [J]. 红旗文稿, 2023 (24): 38-41.
- [8] 任保平, 李培伟. 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机制和路径 [J]. 经济学家, 2024 (1): 14-24.
- [9] 曲颂, 龚鸣, 陈一鸣, 等. 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 [N]. 人民日报 (海外版), 2024-01-07 (003).
- [10] 侯冠宇, 张震宇, 董劭伟. 新质生产力赋能东北农业高质量发展: 理论逻辑、关键问题与现实路径 [J]. 湖南社会科学, 2024 (1): 69-76.
-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2022 年通信业统计公报 [EB/OL]. [2023-11-18]. [https://wap.miit.gov.cn/gxsj/tjfx/txy/art/2023/art\\_77b586a554e64763ab2c2888dcf0b9e3.html](https://wap.miit.gov.cn/gxsj/tjfx/txy/art/2023/art_77b586a554e64763ab2c2888dcf0b9e3.html).
- [12]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云计算白皮书 (2023 年) [EB/OL]. [2023-11-18]. [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307/t20230725\\_458185.htm](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307/t20230725_458185.htm).
- [13] 李三希, 武珂璠, 李嘉琦. 数字经济与中国式现代化: 时代意义、机遇挑战与路径探索 [J]. 经济评论, 2023 (2): 3-14.
- [14] 侯冠宇, 杨博文, 熊金武. 周期与进路: 中国制度经济学研究三十年 [J]. 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评论, 2023 (1): 63-79.
- [15] 侯冠宇, 熊金武. 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与提升路径研究——基于我国 30 个省份的计量与 QCA 分析 [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3): 89-99.
- [16] 刘耀彬, 聂长飞.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高质量发展的新定位、新内涵与新路径 [J]. 经济学家, 2023 (7): 15-24.
- [17] 侯冠宇. 营商环境对就业的影响与提升路径研究——基于我国 30 个省份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J]. 河南社会科

学，2023（5）：63-72.

[18] 戴小河，胡喆，吴慧珺. 坚持科技创新引领发展 [N]. 新华每日电讯，2023-09-19（001）.

[19] 龚鸣，包晗，宋豪新，等. 通过科技创新共同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 [N]. 人民日报，2023-11-02（002）.

[20] 操秀英. 行业大模型落地将加速产业升级 [N]. 科技日报，2023-06-26（006）.

[21] 高洪伟. 中国式现代化与产业链韧性：历史逻辑、理论基础与对策建议 [J]. 当代经济管理，2023（4）：11-19.

[22] 中共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 深刻把握六方面重大关系的实践要求 以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N]. 中国改革报，2023-10-08（002）.

[23] 侯冠宇，胡宁宇. 支付数字化能否显著提升家庭消费？——基于 CHFS 微观数据的经验证据 [J]. 经济与管理，2023（1）：20-28.

[24] 季晓莉. 2023 年全球经济预计增速 3.1% [N]. 中国经济导报，2023-11-02（003）.

[25] 朱最新. 地方执行性立法的路径选择与优化生成 [J]. 政治与法律，2024（1）：13-24.

[26] 张震宇，侯冠宇，张春华. 产业结构升级研究进展、热点探析与趋势展望——基于 CiteSpace 文献计量分析 [J]. 生态经济，2023（6）：220-227.

[27] 戚聿东. 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03-30（001）.

[28] 胡杨. 人口结构变化催生资产配置变局 [N]. 中国银行保险报，2022-12-19（005）.

[29] 袁婉潼，乔丹，柯水发，等. 资源机会成本视角下如何健全生态补偿机制——以国有林区停伐补偿中的福利倒挂问题为例 [J]. 中国农村观察，2022（2）：59-78.

[30] 汪莉，陈玥彤，崔珊珊.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化解过剩产能与企业盈利能力 [J]. 社会科学，2023（7）：122-135.

[31] 许光伟. 《资本论》的工资理论逻辑：基于价值形式的统治场论 [J]. 经济纵横，2023（10）：11-23.

[32] 王名，蓝煜昕，高皓，等. 第三次分配：更高维度的财富及其分配机制 [J]. 中国行政管理，2021（12）：103-111.

[33] 朱雅玲. 全国统一劳动力要素市场与中国式现代化：内在逻辑、互动机理与实践路径 [J]. 河南社会科学，2023（12）：46-55.

[34] 刘珺蓓，周泳宏. 贫富差距歧视与主观幸福感 [J]. 产业经济评论，2023（2）：91-115.

[35] 张震宇，侯冠宇. 数字经济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现实路径 [J]. 西南金融，2023（11）：32-44.

[36] 张明明，刘俊显. 数字经济生产力助力共同富裕——双重效应与实践路径 [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23（8）：1-4.

[37] 张杨，范迪. 数字经济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发展模式探究 [J]. 管理学报，2023（4）：146-158.

[38] 叶书宏. 开启世界现代化的崭新篇章 [N]. 新华每日电讯，2023-10-24（001）.

[39] 何元浪，刘欣宇. 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 [J]. 理论研究，2023（5）：45-53.

[40] 吴艺楠，李芳琪，赵芳，等. 生态环境准入制度衔接成效、问题和优化建议 [J]. 中国环境管理，2023（5）：11-15.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Empowering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Pathways

Zhang Zhenyu<sup>1</sup>, Hou Guanyu<sup>1,2</sup>

(1. Business School,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0088,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Qinhuangdao 066004, China)

**Abstract:**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have become the core driving forces of the curr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lthough China has made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how to effectively improve productivity,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industry, enhance the level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overcome the shortcomings of core technologies are still urgent practical problems that need to be solved. At the micro level,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 is mainly manifested as a leap i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a reform in enterprise organizational models. At the meso level, new productive forces are reflected in optimizing the structure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reshaping industrial clusters, and building innovation networks. At the macro level,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have opened up a new mod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mproving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society.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not only symbolize the innovative, green and modern advanced production mode, but also drive the efficient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n order to achieve a higher level of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we need to meet the challenges of the global economy and market system, constantly strength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continue to deepen the practice and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reform.

**Key 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责任编辑：张积慧)